

近代序跋文选译

● 朱宗震 王欣嘉 ●



巴蜀書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序跋文选译

朱宗震 王欣嘉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周伯谦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序跋文选译

朱宗震 王欣嘉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2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敏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致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指引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序和跋，作为一种文体，一般说来，都是用来说明一部作品的宗旨、内容、成就、特点，以及写作或编辑的经过，写作或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序，也称叙，放在一部作品的前面，跋放在一部作品的后面。在当代文化界的习惯上，前言也相当于序，后记相当于跋，不过，前言主要是说明内容，后记则用来交待一些具体问题。而在古代，序也有放在后面的习惯。这本选译中，选了一篇后序，相当于跋文。同时，在我们选译的范围内，序和跋在内容上并无明显区别，这同当代的习惯也不相同。

我们在对近代序跋进行挑选的时候，本希望在题材上能广泛一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的序跋，但事实上未能做到。除了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之外，主要是近代时期，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尚无根本改变。中国古代比较规范化的系统教育，主要是政治伦理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从小学念三字经开始，到八股文考试，都集中在这一领域。接受了系统教育的文人们不是做官，就是当幕僚，替做官的办事，或出谋划策。没有

功名的布衣们，也仍然以政治领域为其发展前途。而其他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文化、技术、科学知识的传授，只停留在师徒相传的水平，不为社会所重视，没有形成系统教育的体系。就是像天文、医学这些为国家、社会高度重视的学问，也往往和政治挂上了钩，由受过政治理论训练的人兼做这些工作。所谓不能作良相，也要作良医，就是这种社会习惯的集中体现。虽然，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各种科学知识先后向中国传播，但是，中国的整个社会体制还没有来得及变化。从事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技术、科学工作的人，真正接受过新式系统教育的人，还是凤毛麟角。中国社会上，接受过系统教育（包括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人在内）、有文化修养的人，仍然麇集在政治领域，从事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即使在经济领域，实业的发展，仍然是由政治来号召的，和政治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张謇，他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间资本集团——大生集团的领袖，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领袖。由于中国社会的这种士大夫传统改变很慢，在中国近代，主要的有影响的著作，依然是政治方面的著作。所以，我们本来设想的题材多样化，就碰上很多困难。为了使这本书的选材，不要过于枝蔓，我们也就顺其自然，仍然以政治书籍方面的序跋为主。尽管题材范围受到局限，但序跋既然是一种文体，我们在选材的时候，仍尽可能照顾到体裁的多样性。例如，长序和短序，自序和他序，不同思想、不同风格的人所作的序，作序的人和书籍的作者或编者之间，具有不同社会关系的人所作的序或跋。因为，序跋的风格，既因作者本身风格的不同而不同，也因作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例如，龚自珍为《鸿雪因缘图记》写的序，既反映了这位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者不落俗套的风格，也

符合他作为晚辈且正在作客的身份。曾国藩为《王船山遗书》写的序，他作为一个功高震主的名臣，却和一位在乱世隐逸山野的思想家发生共鸣，序文意蕴深长，值得琢磨。郭嵩焘为死去的儿子遗稿写的跋文，则反映了亲子之情，短短的跋文，字字都有力量。薛福成为其日记写的自序自跋，既扼要地介绍了异国的风情，又抒发了变革的宗旨，前后呼应自成体系。这本选译收入的梁启超的两篇序文，一是以学生的身份，阐明老师作品的宗旨，一是以编者的身份，阐明编辑的意图，虽然同样纵横潇洒，但因身份不同，写法也就不同，前者留有余地，后者直抒胸臆。柳亚子和宁调元的序文，则代表了秘密革命时期行文含蓄的风格，具有时代的特色。而且，他们的序，一是为一种杂志的创刊而写，一是为一种诗社的成立及其诗集的编选而写，也是序文的变例。《民权初步》，以及《会议通则》的两篇序文，一是孙中山的自序，一是章太炎应孙中山之托写的序文，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对一本书的功用作出同样的估价，对于政治功利性极强的著作，这样的序文有其特殊的作用。这本选译的时间跨度，从 1841 年到 1919 年，大约八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文字风格正在激烈变化的时期，我们所选的序跋作者，有鸦片战争时期的龚自珍，戊戌时期的梁启超，辛亥后的蔡元培，他们的文字风格，从古典的文言文，向着白话文的方向演变，越来越通俗化，具有代表性。当然，由于时间的断限和译文的体例，这本选译没有收入正在兴起的白话文运动的文字。

由于我们确定主要选译政治书籍方面的序跋，我们也就力求通过这些序跋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脉络，因此，在选材方面也就力求有系统。当然，题材本身不是近代政治

思想史，而且，受到本书篇幅的限制，不可能面面具到。从目前入选的作品来看，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在这些序跋中，大体上都有所反映。

关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在这里我们作一点简要的说明，以便对入选序跋的背景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长期的国内和平生活，使士大夫们处于和平麻痹状态，居安而不思危，上流社会顽固保守。学术上，宋学，即理学，空谈性命理气，而汉学，即朴学，热衷于经学的考据和整理，同样不关心国家的安危治乱。只有少数有远见的士大夫，以龚自珍为代表，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呼吁对国家政治有所变革，在中国近代，起着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呼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得到的回响很少。中国政治的变革，只有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传统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之后，出现了从基层崛起的湘淮军政集团，才得以有所行动。湘军领袖曾国藩能够和王船山发生共鸣，是因为他们都有变革的要求。然而，时代不同了，一个先进的欧洲，对中国正虎视眈眈，仅仅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变革经验，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可惜，这时期的变革派，他们的政治思想还依然是十分传统的，单纯地按传统标准追求人才和吏治。他们还只是朦胧地认识到欧洲船坚炮利的功效，而依然认为，中国的文武典章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因此，在政治思想上毫无近代科学、民主观念。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但由于地理的隔阂，与世界最早进入文明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缺乏文化交流，然而，伟大的内省精神，仍然使中国文明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中国的中

原地区，以汉民族为主，在几千年间，统治王朝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强还是弱，对于周边地区，在文化、经济、科学技术方面总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继承汉民族文化的各个王朝，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汉文化中祖先崇拜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使中国人崇拜三代之治，向后看的复古思想是中国人的一个顽症，即使是时代的佼佼者也不能免。当欧风东渐之后，中国人即使面对军事失败，要根除这种几千年形成的优越感和复古思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们选译的序跋中，有好几件是当时主张学习西方、主张变革的先进分子写的，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我们今天看来是奇奇怪怪的逻辑。例如，认为欧洲近代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传入欧洲后发展起来的，欧洲的各种典章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在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欧洲的状况下，仍然在鼓吹中国古代文明是最理想和最优越的文明，仍然坚持儒家经典中的政治原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包括先进分子在内的主导思想。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开始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议会制度，提倡民权，反对专制。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还很难动摇，康有为搞的还是“托古改制”的一套办法，《新学伪经考》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以恢复经典著作的原意为理由，来阐述新的思想，借用权威的名义，来动摇权威的统治，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套办法。当然，这套办法对创始者来说，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办法，康有为、梁启超曾想把孔子作为教主，向全世界传播，这当然会阻碍他们继续进步。但对社会来说，只是一个过渡办法。当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他们就不太需要借用古人的名

而，他的书名只是写作《谦豫编图》，这不是明明白白证明了我上面说的话吗？

今天天下太平安定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然而海上敌人的侵略还没有平定，因此麟公会去石公山检查海防及武器情况。麟公以河道总督的身份兼任临时代理两江总督，这不过是稍微试一试他的才能。皇帝准备更加重用麟公，麟公即将总管天下的财政，整理筹划，以便使公家和个人两方面，上上下下都很富足，然后，再担任军机大臣，直接辅佐皇帝。皇帝激励表扬清正廉洁的官员，使读书做官的人看到的和听到的焕然一新，使一个时代的风气都振作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海内的人一个个都崇敬盼望麟公的原因。那一百六十篇都只是开了一个头。再过十年，我希望能够再为麟公作序，我将恭恭敬敬地把笔蘸饱了墨等待着。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年七月三日，内阁后进的官员、仁和龚自珍顿首拜篆^①。

^① 仁和：龚自珍的籍贯，清代仁和（今浙江省杭州）人。当时人在自称和称他人时习惯上加上籍贯。以下同，不一一加注。

目 录

前言	(1)
龚自珍	
《鸿雪因缘图记》序	(1)
夏 婉	
《中西记事》原叙	(7)
曾国藩	
《王船山遗书》序	(12)
胡林翼	
《读史兵略》序	(18)
郭嵩焘	
跋《亡儿遗稿》后	(24)
李慈铭	
《桃华圣解庵日记》自序	(26)
陈 炽	
《盛世危言》序	(30)

王 韬

- 《盛世危言》《易言》跋 (40)

魏光焘

- 《戡定新疆记》自序 (52)

薛福成

-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序 (61)

-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跋 (65)

马建忠

- 《马氏文通》序 (74)

杏 园

- 《湘绮楼全集》跋 (85)

朱还氏

- 《公车上书记》序 (89)

康有为

- 上海强学会序 (94)

梁启超

- 《新学伪经考》叙 (98)

- 《西政丛书》叙 (102)

张之洞

- 《劝学篇》序 (109)

王同愈

- 《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序 (119)

杨 度

- 《日本学制大纲》后序 (123)

胡思敬

《驴背集》自序,	(131)
端 方	
《张文襄公诗集》序	(133)
柳亚子	
《神州女报》叙	(137)
宁调元	
南杜序	(142)
宋教仁	
《武昌两日记》叙	(146)
卜世藩	
跋《太一遗书》	(148)
孙中山	
《民权初步》自序	(151)
章太炎	
《会议通则》序	(161)
蔡元培	
《勤工俭学传》序	(165)
蔡 钔	
《盾鼻集》序	(174)
张 窦	
《中国关税问题》序	(179)
后记	
	(184)